

导 论

一、语言学与时代思潮

一个学科的发展，有两个方面的决定因素，一是学科自身发展的规律，一是时代思潮的影响。时代思潮联系着社会文化背景。我们常说，“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在相互作用加强的情况下，外因的作用越来越显得重要了，特别是在社会、经济、文化方面。

在语言学发展中，什么是外因呢？外因其实就是时代思潮，一般包括哲学思潮和科学思潮。一个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思潮，总对各个具体学科有比较大的影响，其中包括语言学。语言学总是与社会思潮紧密联系的。

语言学思想有时是时代思潮的延伸，有时是时代思潮的先导，总之，它不会离开自己的时代社会背景。

语言学常常是时代思潮的先导，例如历史比较语言学产生之后，立刻被应用于神话学、宗教学，于是有了比较神话学、比较宗教学，后来又被应用于文学、哲学，于是又有了比较文学、比较哲学等等。再如，结构主义语言学产生之后，首先被列维-斯特劳斯引用到人类学分析中，后来又被引用到文学甚至社会学中去。有人统计，索绪尔书中所用的 35 个词语，沿用至今，特别是共时、历时，能指、所指这些关键性词语，已普遍使用于其他许多学科。人们常说语言学是领先学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讲要使语言学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思维科学，即指发挥其先导作用。

语言学为什么在人文科学中能够发挥先导作用呢？这是由语言学研究对象的特点决定的。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语言具有物理、生理、心理和社会四方面的基础。物理、生理是物质性的，便于作定量分析；心理和社会因素是通过语音物质表现的，于是就架起了自然到人文社会的桥梁，便于对心理和社会因素进行缜密分析。所以语言学在严密性、精确性的程度上超过一般人文科

学。在语言学上的任何突破，必定对其他人文学起到领路的作用。

另一方面，语言学又是时代思潮的延伸。从语言学史来看，古代语言学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只是哲学的一部分。古代希腊罗马语言学中关于名称与事物关系的本质派和习俗派的争论，中国先秦诸子百家关于名与实的争论，都既是语言学问题，更是一个哲学问题。中国语言学后来的发展，一直是与读经，进而理解古人思想相联系，它只是经学的附庸，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 19 世纪末。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使经验唯物主义和理性主义成了那个时代的主旋律。经验主义以英国的培根、洛克为代表，在语言学上的反映是古典语文学的兴起。理性主义思想的代表是笛卡尔，在语言学中的反映是法国玻尔罗瓦雅尔学派，这个学派冲破传统经验主义，提出了“普遍唯理语法”，认为语法基于人类的理性和思维。理性语法统治欧洲好几个世纪，到 18 世纪末历史语言学初露头角。到 19 世纪初，开始流行机械主义，这就反映在葆朴的语言学观点中，这是欧洲大工业发展在语言学中的反映。19 世纪中期有施来哈尔，他是历史语言学中期的代表人物，他把达尔文关于物种起源和发展的学说运用于语言学领域，其谱系树理论正是达尔文学说在语言学中的反响，他主张“把达尔文所建立的关于动植物物体的规律至少大体上也应用于语言的机构”。

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心理社会学派的索绪尔和梅耶，受的是涂尔干（又译迪尔凯姆）、弗洛伊德的影响。涂尔干是实证主义、唯理主义者，反对在生物学和心理学中寻找社会问题的原因，所以索绪尔是反对施来哈尔的生物主义的。到了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所谓布龙菲尔德时代。布龙菲尔德是美国结构主义的代表。其时代背景的特点是当时哲学中的逻辑实证主义和心理学中的行为主义在美国的盛行。20 世纪下半叶，乔姆斯基的大脑先天机制理论和转换方法，则是高科技时代的产物。至于 20 世纪的语言学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则具有普遍的意义，特别是对我国语言学理解语言的起源、语言随社会发展而发展、语言与思维的联系以及为我国政府制定语言平等政策等方面的影响更加明显。所以说，语言学从来就与一定的社会背景和思潮紧密联系，它同样植根在当代社会现实之中。

21 世纪的语言学与马克思主义又会是什么关系呢？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史的丰富论述，将是我们文化语言学的重要指导思想，中国的文化建设的每一个方面都是不能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者关于民族和语言的深刻见解，也将成为文化语言学体系的思想来源之一。尽管如此，语言学仍将沿着自己学科的运动规律向前发展。不论学科任务还是对语言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都离不开唯物辩证法规律的支配。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将在现实运动中不断深化和发展。语言学作为人文科学中的一个领先学科，应该在对客观规律认识的深化中为丰富马克思主义做出贡献。

中国语言学长期以来有重实际轻理论的传统，这使我们虽在汉语的具体研究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在理论上成果不多。一个世纪以来，我们介绍了不少西方和苏联的语言学理论，但我们自己却很少创新。现在，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长和学术界的思想解放，我们已有可能利用后发优势，在语言学理论上逐渐赶上并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事物对立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人类历史上通过跳跃式发展而后来居上的实例屡见不鲜。要做到这一点，第一是要吸收时代思潮的新养料，第二是吸收古人思想资源中的有用成分，从我国和世界的语言实际出发，在当代高度上探寻新的起点。从语言学的发展史来看，一个思潮接一个思潮的更替，开辟了语言学研究的领域，使人类对自身思维及语言现象的科学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科学思潮常常有跳跃式的跨越，这种跨越不可能在原有的思维框架内完成，这就要实现一次次思维框架的转换。

二、语言学研究思维框架的转换

到了 20 世纪与 21 世纪的交替之际，我们看到科学的发展，正朝着大综合的方向前进，多学科交叉渗透成为科学发展的普遍趋向。这个进程将涉及一切科学，语言学借鉴其他学科的最新成果来推动本学科的发展将具有重大意义。语言学的大综合性质，从表面来看，就是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结合，在方法是归纳和演绎的结合，在时间上是历时和共时的结合，在范围上是外部语言学和内部语言学的结合；但从深处来看，这种结合并不是正反相加，而是在一个崭新的层面上实现划时代的变革，也就是要完成一次思维框架的转换。

什么是思维框架？它是在一定领域内认识自己研究对象的见解以及思维方法和操作方法的总称。思维框架随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地变化，语言学的发展也不是在相同的思维框架内连续发展的。思维框架的转换不是原有思维方式的延伸，也不是原有研究方法的拼凑和增减，而是“打破现状的思维”。新的思维框架只能在打破现状思维的情况下，在人类科学文化总体发展新动向的相互作用下才能产生。我们关注的是：有什么科学文化的新动向有可能影响 21 世纪语言学的走向呢？有什么新的思维方向将促进语言学的革新呢？

这个新动向就是现在已被学术界公认的关于多学科交叉综合发展的普遍趋向，而这里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在自然科学中发展起来的浑沌学理论，它已在生物学、物理学、化学、数学、天文学领域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近年来又应用于经济学和医学，都已获得显著的进展。它将同样适用于语言学。

什么是浑沌学？用最通俗的话来解说，那就是一门以直观、以整体为基点

来研究混沌状态的复杂规则性的学问。在经典科学中，有“有序”和“无序”一对截然相反的概念。“有序”指空间分布上的规则性和时间延续中的周期性；“无序”指空间分布上的无规则性和时间延续中的随机变化。“有序”和“无序”这两个矛盾方面都很强烈时形成的运动体制，就是混沌运动。过去人们都只注意到简单的有序现象，现在人们知道，有序运动并不是现实世界的普遍存在形式，混沌运动才是普遍的。语言学像其他科学一样，不论历史语言学还是结构主义语言学，过去都只注意这种有序状态，着眼点都是运动的平衡态和周期态。其实，语言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符号世界，而是一个开放的、演化的、有着大量外界干扰的复杂系统。这个系统不是一个确定性的、简单和谐的模式，它常因系统内部一些微小的不确定因素，或来自系统之外的某些微小干扰，就可导致巨大的、不可预测的波动。

一切混沌现象都与非线性问题有关。以往的语言学只把语言看成是一个线性系统，历史语言学和结构主义研究语言，使用的都是线性分析的方法。其实，语言分析中存在大量非线性问题，都需要用混沌学的理论和方法加以把握。混沌学对语言的整体把握，将跨越以往语言学只停留在语法层面和词语选择层面的局限性，而兼及言语者群体和个人的个性气质、交际意图、语境以及语言整体和民族文化整体之间的联系。它有可能为语言学提供一个语言现象之间和语言与文化之间穿插对应和随机对应的新的方法论模式。一种新思潮的产生，如果没有方法论的支撑是不可能的。21世纪的语言学必将实现一次思维框架的转换，即从理论到方法都将焕然一新。这个新的思维框架，与当代的社会实际、时代思潮和科学发展紧密联系，将使语言学在理论和方法上引起划时代的变革。

语言学曾经是一门领先学科。由于语言学研究对象的规律性和系统性有着高度的严密性，使它在人文科学中成为精密分析的典范。如今，语言学将语言事实与民族文化、民族思维方式联系起来，它的意义将超越语言自身，进而探索人类高级思维活动的特点。文化语言学不仅承认语言的民族性和思维规律的共同性，而且揭示人类思维活动规律的民族性。在21世纪这个高科技时代，文化语言学集各民族思维活动的特点和精华，它将造福于全人类。

在21世纪多中心、多元化的世界格局中，语言学也将是多中心、多元化的。但将语言与文化联系起来作整体考察，应是各个语言学专科的共同需要和共同趋势。语言与文化的结合，将使语言学从20世纪形式主义自我禁锢的牢笼里解放出来，它联系当代的社会现实，从而获得新的社会价值。

三、走向文化语言学

现在越来越让人感到语言学对社会实际的依附性。当代的社会实际将决定语言学的走向。在世界范围内，当代的社会实际是什么？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看到世界形势呈现一种多中心、多元化的趋势。欧美中心主义已经动摇，原来的二元对立格局也已经结束，现在滚滚而来的是民族独立和地区性组合的不可阻挡的浪潮。在这股浪潮中被高高举起的是民族文化的旗帜，世界文化的多元化成了国际关系中最有代表性的事实。

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奥林战略研究所所长亨廷顿发表了一篇引起全世界关注的论文《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认为以往的君主的权利之争、民族国家之争和意识形态冲突都已过去，将来主宰全球政治的是文化与文化的冲突，而文化与文化之间的断层线，会是未来的主战场。作者把文化差异看成是人类最基本的差异，认为文化的特性和差异较少可变性，与政治和经济相比，更不容易协调和消解。论文发表10年来，引起过世界范围的大辩论，其中责难和质疑大大超过赞同。不过，不管亨廷顿的主观动机是什么，也不管其文章的论据有多少漏洞，但其客观效果却激发了非西方世界的民族意识和对自己传统文化的珍视。由这篇文章引起的俄底弗斯效应，对于加速西方中心主义的皇冠落地，无疑起着积极的作用。亨廷顿的最初动机可能是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出谋划策，但其实际后果却是提高了非西方国家的警觉和民族自尊自卫心理。以亨廷顿论文为起点的文化问题大辩论，推动着各国家各民族对文化民族性的关注。可以预见，文化问题将是21世纪世界格局中众多问题的焦点之一。

中国由于特殊的社会原因和文化背景，带着自己民族超前的敏感性，从20世纪80年代就掀起了一场文化热，至今势头有增无已。在这股文化热中，产生了语言学的新思潮——文化语言学。现在大家已逐步认识到，民族文化中最鲜明的标志是语言，民族文化的盛衰与本族语言的存亡是直接相关的。维护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是民族独立和发展的标志。在这种社会思潮推动下，将语言和文化联系起来，从文化的视角来看语言，把语言看成是主要的文化现象，就成了我国文化语言学的催生剂。又由于文化意识的崛起与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相关联，文化语言学将是非欧美语言学的重要动向。因此，文化语言学只能产生在东方、产生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文化语言学将语言与文化联系起来，将语言纳入文化的大范畴之中，这是中国的特点，有着深厚的文化背景。中国古代语言学是为了解读先秦经典，如今语言研究成了文化阐释的根本，在世界大格局中中国语言学作如此的推移，这既是形势所趋，又是顺应自然的。

上 编 理 论 与 方 法

第一章

学 科 定 位

第一节 学科缘起

文化语言学是一个新兴的理论语言学学科，是两个世纪以来语言学理论发展合乎逻辑引发的必然结果。它的兴起有当代社会现实的客观基础，是顺应时代的需要而产生的。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东西方冷战状态结束，一个建设多边合作与多边竞争的人类社会新时代开始出现。文化的欧美单一中心论已经破灭，文化的二元对立关系也已经瓦解，世界逐渐形成了一种多中心、多元化发展的趋势。随之，世界文化格局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其最显著的一个特征是第三世界民族自我意识的崛起和对自身文化的肯定。一方面许多国家和民族的传统文化保护意识普遍提高，民族传统文化的特殊价值受到格外珍视；另一方面，世界文化的多元互补也逐渐成为世界各族人民的共识。这个时期世界范围内兴起了空前的文化大辩论，这场大辩论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一门综合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综合研究人类生存环境、生活状态和思维方式的“文化科学”应运而生。

这个时期，中国正处在一个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先导的社会主义全面改革的新时期。我国几千年积累下来的文化观念与商品经济和工业社会的文化观念相悖，必须通过改革来改变这种现状。改革既是一场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中国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期待着先进的文化观念作为先导。伴随着经济、政治改革的要求，与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大辩论相呼应，在我国思想文化领域也出现了一个称之为“文化热”的文化研讨热潮。这场研讨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基础，将中国当代文化置于世界文化的背景之中，把民族意识和全球意识结合起来，把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统一起来。各门科学之间相

互配合、共同研究文化问题，打破了以往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传统界限，远远超出了传统的学科范围和领域。这场讨论热潮一直持续了十余年，进一步促进了中国社会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更新，对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推动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随着文化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普遍认识到：一个民族文化的兴亡与本族语言的盛衰是直接相关的；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中最基础又是最核心的部分。一个民族的文化成就只能通过本族语来积累，一个民族的文化创新也主要由本族语来完成。被压迫民族的觉醒和解放决不仅仅意味着政治和经济的独立，而更突出的是要求保护自己的文化和语言。非洲和东南亚许多民族原来以殖民主义者的语言——法语或英语为官方语言，随着他们国家的独立，接着就确立当地一些语言为官方语言，这些事实很好地说明语言往往是民族独立和发展的标志。我国的情况也是如此，解放前少数民族处于被压迫的地位，他们的语言也受到压制和歧视。新中国建立后，实现了民族平等，各民族的语言和文字也受到尊重。宪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和文字的自由”。这很好地说明语言平等是民族平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说明语言作为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但与此同时也存在另一种情况，就是在当前实现现代化的全世界潮流中，普遍存在一种语言向统一方向发展的趋势。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人们共同使用一种信息量大、使用面广的语言，有利于本民族、本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年轻人掌握这样的共同语也有利于个人升学、就业和人际交往。这种语言求同的趋势势不可挡，于是，在语言的接触和较量中处于弱势的语言就面临一种母语危机。母语危机威胁性最大的是那些处于现代生活边缘的小语种，这种语言使用人口少，没有文字和文献，当地经济和文化原来比较封闭，在卷入现代生活潮流之后就可能消亡。另一种情况是较为普遍的，即在两种语言的接触中一种语言的使用者看到另一种语言有更大的使用价值，从而轻视甚至放弃自己的母语而去掌握和使用另一种语言，这也会影响母语的发展，进而造成母语贬值。在社会现代化的潮流中，世界上肯定会有一部分语言要消失。如果语言果然只是一种工具，那么，哪种工具好使就使用那种工具好了，哪种工具用途广、效率高，就使用那种工具好了，语言的消失就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问题在于语言不只是工具，而且还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晶。失去一种语言，就是失去一个文化系统中最基础的部分。文化，概括地说，它是一个民族或群体对特定环境的适应能力和成果的积累。每一种适应环境能力的获得，都是对人类文化宝库的贡献，对人类整体的进步和发展都是有价值的。因此，第三世界国家保护自己民族语言的努力，并不仅仅意味着保护自己民族存在的一个“标志”，而是保护一种对全人类都有价值的文化。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推动了

语言学认识自己研究对象（语言）的文化性质和文化价值，这就是文化语言学产生的客观基础和现实依据。

民族意识的崛起虽对文化语言学的产生有决定的意义，但它并不是直接的，其中还有一些中间环节，促进了语言学的改革。

在这些中间环节中最主要的一环，就是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再认识。一个民族的存在价值就在于它有维系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而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语言，而其他组成部分包括文学、哲学、宗教、法律甚至民俗等等，又都依靠语言来体现，于是，语言与文化就被有机地联系起来。挖掘和发扬本民族的文化，就不能不研究本民族的语言。

这些中间环节的另外一环，就是双语教学的发展。双语教学是引导人们在母语之外学习另一种语言，但实践表明，学会另一种语言就是接受另一种文化系统，这使语言与文化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了。在双语实践中人们还不难发现，掌握第二语言的难易往往决定于学习者母语水平的高低，而第二语言的水平往往很难超过学习者的母语水平，这使人们更加认识到母语作为一种文化模式在思维发展中的重要性。

此外，还另有一个环节，即民族意识的崛起总要体现在这个民族成员文化水平和心理素质的提高上，而文化水平和心理素质的提高往往首先表现为语言运用能力的提高。在这一点上，语言与文化的一致关系是再明显不过了。因此，是文化问题推动了文化语言学的产生。

文化语言学在中国产生有其特有的有利条件。

当代中国是发展文化语言学最肥沃的土壤。我国的语言资源和文化资源都十分丰富。我国有 100 多种语言，分属五大语系，类型多式多样，各语言内部结构各有特点。使用这些语言的民族，又各有自己的文化模式。我国各民族又都有悠久的发展和迁徙的历史。在长期的大分散小聚居的民族关系中，语言交往和文化交往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另一方面，一百多年来我们学西方，对西方语言的了解和掌握超过西方人对东方语言的了解，因此，我们在具体语言知识方面具有优势。

现代语言学中心在欧美，我们处在边缘位置，我们把西方的历史方法和科学方法搬运过来，应用于东方语言的分析，虽然应用得尚不理想，但我们兼有东方语言学和西方语言学的较多知识。我们有自己以文字、音韵、训诂为主要的语言学传统，又有西方历史方法和科学方法的参照系，这使我们在语言学知识方面也具有全面多样的优势。西方人自己处于中心地位，不容易达到对东方语言学的深刻理解，而东方人对西方语言学的了解超过西方人对东方语言学的了解。

语言学的发展总与相关学科有这样那样的纠葛，因为语言本身是一个多维

性的实体。从话语生成和话语理解的角度来看，语言是一种生理心理过程，说话、听话离不开人的感官、肌肉、神经系统 and 大脑皮质，离不开人的思维、能力、情绪和知识系统，这就是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病理语言学和儿童语言学产生的基础。从功能上看，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社会的存在和进步体现在语言共时平面的差异上，而语言又几乎是同步地反映社会各方面的变化，这就是社会语言学产生的基础。把语言与特定的文化环境和社会背景联系起来，以弱小民族语言特别是无文字民族的语言为研究重点，这就是人类语言学、民族语言学产生的基础。语言离不开大脑，而计算机是仿造人的大脑。结合计算机的原理、方法来研究机器翻译、人机对话等人工智能方面的项目，形成了计算语言学。再有，任何科学都离不开精密化和科学化，而数学则是使各门科学精密化、科学化的一门横断科学，运用数学模型和程序对语言进行定量化和形式化的研究和描述，产生了数理语言学。

语言与文化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由来已久，因为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文化的发展离不开语言，语言又是文化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与多元性在语言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我们正是通过语言才完整地了解、把握了这个多样化的世界。没有人类就没有语言，但没有语言也就没有人类文化，没有人类世界。语言不但受一种语法和逻辑的束缚，而且也受文化和传统的束缚，使用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某种文化上的承诺。

由此看来，在上述多种因素基础之上产生的文化语言学乃是学科发展过程中十分自然的现象。

第二节 学科性质

语言学对其各个分支学科来说，是一个总体学科的名称。由于语言具有多方面的属性，由于研究目的、研究范围和方法的不同，在这个总体学科之下已经形成了门类众多、性质不同的分支学科，文化语言学与其他语言学分支学科之间是一种相比较而存在的语言学分支学科之一。语言学科的不同分支有各自形成的学科背景、学科地位、学科功能，以及在学科中的不同的作用和价值，彼此谁也无法替代。

文化语言学是一门研究语言的文化性质和文化价值的综合性的语言学科。文化性质指语言本身就是文化，是一种文化现象；文化价值指语言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容，是体现文化和认识文化的一个信息系统。这个学科虽然具有某些边缘特点，但从理论到方法都是以语言为基点的，所以说是一个语言学科。由于这个学科思想来源的多元性、研究对象的多元性和研究方法的多元性，所以它具有广泛的综合性。

这个学科的综合性的首要表现在对以往语言学成果的继承上。作为一个新兴学科，它没有自己直接的先行者，过去语言学各种思潮各种流派都有一部分内容和方法为文化语言学所汲取，成为自己材料的出发点。文化语言学与以往语言学的渊源关系，就体现在对各方面成果的广泛吸收和利用上，例如历史语言学的比较方法、结构主义的音位理论、乔姆斯基的深层表层理论、社会语言学的城市方言理论和调查研究方法、人类语言学的无文字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等，此外，还有我国传统语言学的文字、音韵、训诂研究，现代汉语语言学的孤立型语言描写，民族语言研究中的多类型语言调查研究方法等，这些就构成了文化语言学思想来源和方法的多元性。文化语言学在研究对象上也比以往语言学具有更广泛的视野。历史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最初只是印欧语系语言，结构主义语言学重点也是印欧语言的结构分析，转换生成语法的实际对象限于现代英语。人类语言学的眼界越出了印欧语言范围，去记录和分析没有文字的印第安人的语言，但其身后都有沉重的西方文化背景，都是站在西方文明的基点上去观察异民族的语言文化，难免在视角和观念上受到限制。在社会语言学的多个派别中，贡献最大的应是以拉波夫为代表的城市方言学派。这一派提供的社会方言概念以及从共时到历时的研究轨迹的推移，为语言学注入了新鲜血液。但它从理论到方法仍限制在一个局部的范围内，在当代语言学的蓝图上依然处于边缘地带。

中国语言学主要以汉语为研究对象，20世纪30年代以后才对国内少数民族语言进行调查研究。中国传统语言学主要研究汉语的词汇、语音和文字，语法分析相对薄弱。近年来汉语与汉文化研究引起广泛关注，但单一语言与单一文化的关系研究受到材料类型的限制，仍有一定的局限性。

文化语言学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学科，在研究对象上具有两个特点，一是自觉地注意语种的广泛性；二是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观察研究具体的语言现象。文化语言学对一切语言一视同仁，每一种语言的价值要在相应的文化环境中显示出来。因此，文化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一两种语言，而是尽量多的不同类型的语言，这就是这个学科研究对象的多元性。但文化语言学不同于结构主义语言学，文化语言学所研究的语言，不仅仅是它的结构体，而且是黏着文化因素的各种构件（词、语音、语法）上带有的文化意义。从这一点着眼，文化语言学的对象就不好说是语言和文化两者，而是作为文化符码的语言本身。因此，文化语言学不是一般的关系学科，而只能是一门语言学科。

此外，文化语言学是顺应时代潮流和社会现实而产生的一门新兴的语言学科，因此，它又具有十分具体的应用价值，还是一门应用型的语言学。

第三节 学科任务

文化语言学的学科任务就是要揭示语言的文化性质和文化价值，并把语言与人类思维的特点联系起来，进而探索人类高级思维活动的特点。

什么是语言的文化性质？这是说语言是文化现象，是文化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自成体系的特殊文化。

我们说语言是社会现象，这是不成问题的。一切社会现象都是文化现象，这也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是在于我们过去已有一个先入之见，认为语言与文化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因此，不着力去揭示语言的文化性质。

人们过去把语言只看成是一种交际工具，它的功用就是交流思想。信息论把语言的交际过程简化为这样一个程式：“编码——发送——传递——接收——解码”的过程，隐藏在这个过程中的文化意义，完全被人们忽视了。至于这个过程之外的文化价值，更是结构主义者不予理会的。

说语言是文化现象，首先，是因为它是人类文明的成果之一。语言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创造的，属于广义文化之列。语言又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是一种精神文化。语言作为人类适应环境的成果，又是各民族对特定环境的一种适应能力，它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其次，文化作为人类的创造活动和知识的积累，其最基本的特性之一是习得性。语言是习得的，它不是人的本能，不是天生的，也不是遗传的，而是在人的认识活动中形成和完善的，是必须经过学习才能掌握的，所以它具有文化最基本的特性。

第三，语言是人类特有的能力，是在社会性上与人的本质相一致的社会现象；社会现象也是文化现象。

第四，语言作为符号体系，属于人类所特有的第二信号系统。它不仅是意义的代码，而且是文化的代码，语言系统本身也是一个文化系统。

第五，语言是文化的凝聚体，是文化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说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不全面的。因为载体就是承载东西的物体，是运载其他物质的工具。可供运载的物质是独立存在的，运载物和运载工具既可分别存在，也可用别的载体和运载物进行替换。但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则不同，因为一切文化活动和文化创造都离不开语言的作用，哪怕文化中的某些成分在历史过程中消失了，人们仍可通过语言加以复原。这是任何载体都不可能相提并论的。由于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的成果凝聚在语言之中，因此可以说，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不仅以已有的文化成果为起点，而最主要的是以巩固在语言信息中的文化成果为起点。所以，语言不仅是文化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文化总体中最核心的

部分。

第六，文化的发展水平与语言的丰富和准确程度是平行对应的。语言是文化发展的成果，文化又借语言而得以发展。语言结构的进化理论即从孤立语到黏着语到屈折语的发展理论是不能成立的，但每一种语言本身仍是不断发展的。语言的发展水平是以其丰富和准确程度来衡量的，而这一点并不决定于语言本身的类型，而是决定于该民族的文化发展水平。语言不是文化之外游离存在的客体，而是文化整体中有其自身结构自成体系的特殊部分。

这是对语言性质的再认识。一个学科的发展总是伴随着对自己研究对象认识的深化。当葆朴把语言看作一种机械现象时，他便致力于揭示语言的机械规律和物理规律；当施来哈尔将语言理解为一种有机体时，他的研究便集中在描写语言在其生长（形成）和死亡（解体）阶段的生命过程；当乔姆斯基把语言理解为一种人脑的先天机制时，他便着力于开掘句子的再生能力。因此，我们把语言看成一种文化现象，我们的着眼点就要研究语言与文化总体的相互依存和同步发展关系，这使语言的价值获得了最广泛的社会意义，也使语言学获得了空前的生命力。

所以，文化语言学的任务之一，就是揭示语言的文化性质。

文化语言学的任务之二，是研究语言的文化价值，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语言与语言之外其他文化现象的关系问题，诸如语言与文学、哲学、宗教、历史、地理、法律、风俗以至于物质产品、物质行为、社会制度、思维方式、民族性格等文化现象的相互关系问题。由于语言系统中凝聚着所有文化的成果，保存着一切文化的信息，因此，我们有可能通过语言了解和认识、分析各种文化现象，进而探索文化史上的未知状况。历史上消失了的文化现象，语言中还可能保存着。语言也不断发生变化，不断地吐故纳新，但语言学家仍可按照语言内部发展规律加以重建，恢复历史、文化的本来面貌，对这些现象的本质和起源作出解释。

语言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有一个系统的结构。通过语言分析文化现象，甚至比直接对各种文化现象进行分析更加方便，更加清晰。人是社会动物，也是文化动物，我们自身处在文化的包围之中，我们已习以为常。我们力图对一切文化现象都作出准确的分类和解释，但并不能完全做到。而语言，由于其结构的系统性，使人们不自觉地对世界万物作出了分类和解释，从而使一切文化现象从混沌变为有序。

美国描写语言学的先驱、历史学派人类学的创始人博厄斯在研究美洲印第安人的语言和文化时，惊人地发现纯语言学的研究是深入地研究世界各族人民的心理学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研究主要的道德观念的形成时，语言是最容易收效的研究领域之一。在这方面，语言学的优越性在于：语言的范畴是不知

不觉地形成的，因此，不必求助于往往会混淆甚至只会妨碍理解的其他补充说明，我们就可以彻底研究导致这些范畴形成的过程。博厄斯已深深地体会到，通过语言去分析文化现象，特别是他所接触到的那些道德范畴，远比一般化的解释和说明来得有效和可靠。他所说的那些“补充说明”往往摆脱不掉说明者本身的主观因素，而只有语言才最客观地反映民族认识发展的过程。我们所说语言的文化价值就是指对各种文化现象的认识价值。这是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替代的。

语言的构成要素不单单是词，还有语音、语法，宏观地看，语言还有类型学问题，还有谱系问题。过去人们研究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一般都注重词汇，偶尔涉及语法，至于语音，则很少有人注意。其实，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是多方位的，语言的每一部分都会在不同的方面与文化发生这样那样的关系，从而体现出各个部分的文化意义。

文化语言学的任务之三，是在语言研究的基础上探索人类高级思维活动的特点。

文化语言学将各民族文化、各民族的思维方式联系起来，就有可能以精密的方法揭示各民族思维活动的特点。不同民族的思维活动，在其形式逻辑阶段有着共同的规律性，例如在概括的基础上形成概念，以概念为基础形成判断，判断的延伸就是推理。这些逻辑过程，各民族、各种语言的使用者都是相同的，但在进入思维活动的高级阶段之后，差别就显示出来了。例如有的民族重具体感知和整体把握，有的民族重抽象推理和构件分析；而在对事物的分析方法上，有的注重其组合规则，有的注重其组合中的相互作用和变化；在应对方式上，有的以不变应万变，有的随波逐流，应势而动。这些在思维方式上表现出来的特点，都在语言结构组合和表达方式上体现出来，它们各有长短，各有优势和局限。文化语言学可以集各民族思维活动的特点和精华，达到对客观世界更准确、更全面的认识，能够更合理地适应客观环境的考验，更有效地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

文化语言学的性质和任务以及其学科渊源上的多元性和研究对象的特点，决定了文化语言学的方法论基础。文化语言学的具体研究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但新的理论终究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研究方法。文化语言学在继承以往语言学行之有效的各种研究方法之外，必须有新的方法论作为支撑点。这个支撑点，就是当代最新的科学方法论成果——混沌学。

混沌学理论是从研究非线性相互作用系统而逐渐发展起来的。以前我们把语言只看成是一个线性系统，如今我们看到语言系统在非线性相互作用下会产生貌似无规则的复杂行为。混沌学理论独特的概念体系和方法论框架正好适用于语言和语言与文化相互作用的非线性分析，它将推动语言学进入一个新的历

史阶段。

19 世纪语言学着重语言的纵向研究，20 世纪语言学着重语言的横向研究，21 世纪的语言学势必是对语言进行纵横结合的立体研究。文化语言学的大综合的性质，正好使其具备这种立体研究的视角。它反对语言的单纯工具论，但并不否认语言是一种交际工具；它反对语言研究中的欧美中心主义，但并不拒绝使用印欧语材料和研究成果；它反对形式语言学的自我禁锢，但并不漠视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转换生成语法的积极贡献。一个有生命力的学科，必须具有学术上的宽容精神，同时要力求在当代科学的最新水平上实现质的突破。文化语言学作为语言学发展的新阶段，最需要坚持的是不断探索和创新的精神。语言学要与时俱进，文化语言学将拥有一个时代。

思考题

1. 试述文化语言学的客观基础。
2. 文化语言学具有何种学科背景？
3. 简述文化语言学的学科性质。
4. 为什么说文化语言学是一门综合性的语言学科？
5. 文化语言学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6. 语言的文化性质体现在哪几个方面？
7. 浑沌学理论对文化语言学研究有哪些启示？

参考文献

- 陈保亚：《20 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 郝柏林：《自然界中的有序和混沌》载《百科知识》1984 年第 1 期。
- 苗东升、刘华杰：《浑沌学纵横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 邵敬敏主编，史有为审定：《文化语言学中国潮》，语文出版社，1995。
- 张公瑾：《文化语言学发凡》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